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行动至上”就是勤政为民

——读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有感

□ 张文彪

“行动至上”是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贫困地区的一个最大现实就是改革发展、摆脱贫困的任务十分紧迫。习近平在这本书中直指这一紧迫问题，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

行动至上是坚持正确改革目标前提下决策勇气的体现

1988年6月，习近平初到宁德，便和当时地委的其他干部一起走遍了闽东的九个县区。“老、少、边、岛、贫”是他对这个商品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最初观感。也正是在这次调研过程中，他下决心破题改革，探索一条宁德走出贫困的发展之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很快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动员令。所谓“弱鸟”，指的就是当时宁德地区较差的经济条件，是对这一区域经济基础状况的基本定位；而“先飞”则意在果敢行动，不等待不依赖客观条件的改善，立足于现实，把握改革大势，乘势而上。

一般来讲，一个领导者在主政一方时往往会面临“缩小的均衡”与“扩大的均衡”两种治理方式的抉择。前者主要表现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对民众新的利益诉求，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思路和行动上循规蹈矩。这种四平八稳的施政思路看似实现了内部的均衡状态，实则导致了活力的下降；相反，后者则强调在时代巨变面前，敢于担当，主动变革，以巨大的负责任态度回应人民群众的每一个新期待，并力求在这一主动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新均衡。为此，就要坚持行动至上，奋力前行，不惜和固化的、过时的观念、利益以及制度“决裂”。

不论是在筹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落实扶贫政策措施，还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建工作上，习近平始终倡导这种坚持改革行动的精神和逆境中抗争的勇气。同时，他也把这种条件下，一个干部所持什么样的态度，看成是衡量其是否具备优良品质的重要标准，“是临阵退缩，还是知难而进，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去迎接它？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选拔干部就要在面对困难、克服困难上见高低”。“临阵退缩”或“知难而进”，这两种行动中的状态，泾渭分明地区别了合格与不合格的两种干部。在习近平看来，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新生与腾飞的历史转折关头，改革者就应当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主体，碌碌无为和停滞不前就等于放弃发展，因此唯有行动，行动，再行动才会有一切。

行动至上重在确立新的价值目标

在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要把握改革的真理，而且还要在改革中提出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新的价值尺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在习近平看来，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使党的各项工作充分体现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体现群众的愿望和觉悟程度。在把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作为社会实践的最高境界和根本标志的改革与发展背景下，习近平紧紧抓住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实事求是地把改变当时闽东落后面貌、彻底摆脱贫困，作为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价值目标和重大使命。

显然，行动至上思想的提出和确立，不仅强调了在实践中改造现实的积极作为问题，同时明确了实践的直接现实目标——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这就把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决策层面，即不仅注重了实践的真理性问题，同时还注重了实践的价值目标问题。

而且，实现摆脱贫困这一现实目标的过程必须重视新的行动价值取向的确立，即行动本身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习近平明确提出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必须观念先行，“我在闽东的一个乡搞调查时，看到这个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这就值得打个问号了。能够说有主旋律吗？我看不能！”“地区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我提倡振奋精神，淡化‘贫困县意识’。”习近平倡导这一观念体现了其质朴的政治远见。作为领导着一个区域改革大业的决策者，习近平把握住了与宁德干部群众共同的价值取向，他非常看重这种因为价值取向的一致而在改革行动上赢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淡化贫困县意识”的目的是为了不让贫困县意识成为一具观念上的枷锁，使得整个区域缺少有效的内部激励去拥抱改革与创新。放下“贫困县意识”，这是一个具有动力特性的号召：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需要让更高一层的目标愿景来鼓励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正如法国作家安东·圣修伯里所说，如要建造一艘船，关键不是要发号施令、搜集木头、分工细作，而是启发大家对扬帆出海的无穷向往。

行动至上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基本方法

价值目标确定之后，如何有效地行动起来仍然是考验领导者能力的至为重要环节。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习近平强调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有必要摆正一个位置：把解决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个位置的转变，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而且“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很显然，行动必须讲求实效，尤其是必须首先依靠自身的力量，千方百计去解决发展中的一个个困难和问题。因此，行动至上是领导干部治理一方的基本方法。

行动至上是一种展示领导力的基本路径。在习近平看来，党员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都是一种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他指出，“党组织的战斗力就是通过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具体体现的。在过去人民公社的年代，农村党员大多能身先士卒，出工走在前，收工留在后。”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更是要“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为此，习近平提出并建立起干部“四下基层”的调查研究制度。“我们提倡各级领导带任务、带问题深入基层，解剖麻雀。通过深入基层，提高领导机关的办事效率，有利于把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矛盾消弥在萌发状态……”闽东的落后现实往往使人们更愿意对那些在困难面前，总是采取积极行动并取得成效的人做出至善的评价，习近平十分推崇这一点，进而鼓励和要求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积极行动的精神，以此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普遍崇尚奋斗、勤勉服务的行动力。

行动至上是实现摆脱贫穷这一价值目标的根本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不同时代条件下，客观事物和主体的目标之间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因此，摆脱贫困，一旦被确立为必须实现的价值目标，它便决定了闽东改革发展的方法选择的具体指向性。习近平深晓，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闽东人民喘不过气来，而提出摆脱贫困这一目标，就是为了以最直接的方式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改革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也正是通过提出和阐述这一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巨大效用，使自己的改革思路赢得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价值目标向现实转化并不是任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附于实践，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具体行动才能发生作用，它强调的是通过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创造新事物和新生活。在这方面，习近平的明确思路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的第一步要抓那些近期能做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路。”他抓住正在发生的、每天都在变化中的改革现实，以“滴水穿石”的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每向摆脱贫困的目标接近一步，都是行动的结果。

行动至上是开展合理性实践的导向。习近平强调行动至上，在行动方法的选择与判断上，他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究竟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来。”“我们不能还是习惯于过去‘台上讲，台下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应当是深入家家户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农民的心坎上；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我们不能还是想依靠什么行政力量来管住农民，而是应当通过为农民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来使广大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此外，在具体的决策思路上，行动至上的合理性还表现为遇事从不违背规律，从不急于求成，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正是凭着这么一种理性而果敢的行动精神，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习近平走遍了闽东地区的山山水水，深入调研，倾听最基层干部群众的声音，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又一个大胆改革方案；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宁德广大干部群众紧紧跟随着自己的带头人放胆开拓，不断进取。在不停歇的工作与对一个个行动目标的追赶中，习近平与闽东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行动就是实践、就是实干、就是实效，具有行动意义的改革主张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领导者不计个人得失的坚毅行动品格，可以凝聚各方力量从属于一个伟大的改革发展目标。



书而思

用典释义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讲话原文】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

【出处】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管子《管子·牧民·四顺》

【大意】

政权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顺应民心；政权废弛的根本原因，在于违逆民心。民众不愿过于劳累，就应降低民众劳动强度，给予休息。民众不愿生活贫贱，就要想办法改善民众生活、给予民众尊严。民众不愿处于危险之中，就要消除危险来源、增强民众生活的安全感。民众担心生活不下去，就要想办法让民众克服困难，维持生活。

【延伸阅读】

管子，字仲，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管仲担任齐国宰相，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军事能力、经济能力等，齐国经济、军事、民生等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不仅从齐国利益出发，在周王室衰微之际，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尊王攘夷，凝聚众力抵御蛮夷民族入侵，孔子盛赞为“微斯人，吾与谁归”。

《管子》一书，以记录管仲思想为主，其中也有后续稷下学派增补的内容。学界研究一般认为，成书时间为汉代。《管子》内容博杂，以黄老思想为主，汇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既重视民众道德教化，又不忽视法、刑等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还有根据当时生产、生活状况而提出的重视生产发展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思想。如《侈靡》《治国》等篇中对当时较为朴素的生产状况有描述，《形势》篇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与之相应的生存方法，《七法》《兵法》等篇讨论如何养兵、用兵，《枢言》等篇有丰富的哲学辨证法思想等。

（任九光）

互联网社会的权力转移与话语秩序构建

□ 赵 奇

互联网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而且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权力的重新转移和分配。

在传统社会中，权力往往呈线性结构，通常是自上而下逐级贯穿和扩散的，命令和服从是其主要特征。而在互联网社会中，权力呈现出网状结构，通常是分散的、多元的、交互的，讨论和交流成为重要特征。互联网大大增强了社会的透明度、自由度、交换度，这就使得传统的权力被均化了，从过去单向的、上下的、线性的权力结构，转变为左右交织、由点到面的权力结构。可以说，在互联网社会，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监督权大大增加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方式、手段更加多样、更加自由，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交流更加便捷、更加丰富。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力转移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入分析这一趋势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努力掌握互联网社会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出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共存的特点。要在这两个舆论场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建立起符合网络舆论发展规律的网络话语秩序。建立网络话语秩序的核心内容，是确立价值标准。没有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标准，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网络话语秩序。正因为互联网上的声音是多样的、多变的、复杂的，因此倡导和确立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就成为影响这些声音走向的关键所在。

从目前网络声音和网民情绪来看，需要确立的最重要价值标准，应该集中体现在积极、理性这四个字上。积极，就是网上声音的主流应该是体现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意志、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给人以向上力量的声音；理性，就是要主张和引导网民全面看待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从目前我国的网络舆论现实看，消极的声音、非理性的声音还大量存在，积极理性的网络价值标准还只是一种方向性的设想。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需要走很长的路、下很大的功夫。但是，只要方向明确，积极作为，一定会逐步实现确立起积极理性的网络价值标准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

要抓紧建立健全相关的网络法律法规，用法治的手段规范网络价值标准。综观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把网络法律法规作为立法的重要内容。正因为互联网内容的多元化，发布信息方式、渠道的复杂化，决定其根本的规范力量，只能是法律法规。相比互联网在我国迅猛发展，我们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是滞后的，需要尽快建立健全。

要动员和组织主流媒体积极向网络进军，使之成为构建网络话语秩序的主力军。现在，主流媒体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年轻编辑记者，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活跃，熟悉网言网语，既有网上发声的自身动力，又有网上表达的技术能力。把这部分人动员起来，完全可以成为网络秩序建设的主力军。

要大力创建新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特别是要组织和动员一些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专家学者，经常就一些网民关心的问题主动发声，引导网络话语秩序向积极理性方向发展。

要注意关注一些在网络舆论场中自发产生的意见领袖，分析和研究他们的意见主张、在网民中影响力的发展等等，主动与他们沟通，邀请他们参加主流网络媒体的讨论活动，为他们提供正常的、影响力大的发声场所，使他们的意见得到规范，成为网络话语秩序建设的正能量。

要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大量组建网络参与员、评论员队伍。随着移动终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青年人参与网络讨论的渠道、方式越来越便捷，这就为动员和组织更多人参与网络话语秩序建设提供了极好条件。在这方面，要主动作为，有选择、有计划地在一些高校、一些专业组织更多的青年网络评论员，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运用网络特别是移动终端的网语网言特点，随时随地、不拘长短，发表自己的意见。

总之，只要确立构建网络话语新秩序的方向，确定网络话语价值标准，经过努力，一定能够逐步实现互联网空间清朗起来的目标。

学思录

*编者按：*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领导干部读《论语》，可明得失、鉴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从政素养。本报将陆续刊发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钱逊教授解读《论语》的“孔子的治国理念”系列文章。

政者正也

□ 钱 逊



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是一个“正”字。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当时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天子大权旁落，不再能号令天下；诸侯国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大夫僭越专权，陪臣执国命；子弑父，弟弑兄的事层出不穷。正名，就是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理正社会秩序，使各方各得其所。这是传统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

孔子当时所追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有其鲜明的时代内容，是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个要求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然而在正名的具体主张中包含的各得其所的思想，则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也都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调整政府与公民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政府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名篇欣赏

（“孔子的治国理念”①）